

升华文明:现代化指向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

曹恒瀚¹, 任剑涛²

(1. 西南民族大学 哲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2.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在文明的框架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指引的基本方向。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在划分出文明与野蛮界限的基础上,拓展文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促使文明发展划出古今的界限,升华文明发展的总体层次。对中国而言,在其历史发源阶段,就在全球范围内率先突破野蛮、突进文明。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也长期处在领先的位置。在近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受到局限。“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则内涵着接受、转化并创制现代文明的丰富含义。在文明持续发展的进路上,“中国式现代化”所确立的中华民族复兴,以及有贡献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两个目标,既是对现代文明的接引,又是对人类文明的推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的平台上可以得到肯定的基本理由。

[关键词]文明;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4.002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明相关联的表述,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其中一个表述,表达的是中国所秉承的人类文明进步立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1]另一个相关表述,是“中国式现代化”着力创造人类新文明的宗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前者强调的是在文明与野蛮之间所持的文明立场,后者重视的是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与创新目标。这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关系的两个基本维度。

一、以文明理解现代化

将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关联起来表述,是一个凸显现代化基本指向,甚至是本质特点的进路。

作者简介:曹恒瀚,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此,一方面需要对什么是文明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文明的定义多样,含义复杂。简而言之,文明一词包含三个基本意思,“首先,在通常的语言中,文明与价值判断相联系,用以确指开化的社会。它从反面意味着有不文明民族或野蛮民族的存在。其次,文明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集体存在的某些表现可被称作文明现象,如果这些表现由制度和生产加以具体化,就叫做文明事业,某些其他表现显然不配列入这个范畴。最后,文明一词还适用于民族群体或社会群体。文明意味着社会的高度发达,换言之,它具有一系列特征。具备这些特征的社会各有其独特的个性,因而在历史上或在各民族中占有特定的地位,这就是不同的文明形式。”^[3]可以说,理解文明,一方面,必须在文明与野蛮、群性与制度、文明与文明体之间定位。另一方面,根据文明的定义,可以说必须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才能对文明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从总体上讲,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持久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这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跃进。这一方面体现在文明与野蛮的鲜明分界上,另一方面则体现于现代文明相对于古代文明的发展广度与程度上。就前者言,文明与野蛮的划界,是古典文明取得的伟大成就。认知这一成就,需要对两个前提性问题进行分析与确认。一者,认识文明,需要对文明与文化的界限加以区分。这是因为,人们常常认为,人类诞生之后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人类文明史的记录,因此也都理所当然地进入文明发展史。这是一个需要分析的话题。文化与文明,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在一般的定义上,文化指的是人类的所有创造物,不管是物质形态的、还是精神形态的,都包括在内。换言之,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概念,凡是人对自然物加予合乎自身需要的改造,便因此打上人类的活动印记,而构成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就是一个特殊种类的行为的规则。它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行为两个方面,它排斥行为的生物遗传方面。文化规则可以在,亦可以不在个人的行为中

反复出现。但是,一个规则要被称为‘文化’,它就必须以一个既定的方式反复(或反复失败)地出现于一个特定社会的大多数成员的行为中,并被理想化地推定能出现于该社会的全体成员中。”^[4]可以说,文化乃是人类群体活动的产物,是加于自然性、生物性特征之上的人的特征,是具有积淀效应的人类活动成果。它可以大致区分为因应于外部物质世界的物质文化,以及因应于人类内在心灵世界的精神文化两部分。而文明一词,既有与文化一词大致相同的含义,也有与文化一词的含义迥然不同的内涵。文化与文明,都是人类的创造物,但前者用来指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后者则用来指人处理与自身关系的结果。文化可以区分为不同人类集群而创造,而记录。文明也可以区分为不同形态,如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古希腊-罗马、秘鲁、中美洲及西欧文明等等。但因为文明的跨民族性或人类相通性,它还会展现出一种“人类全体的文明”的样态。不过,在人类全体意义上的文明,总是具体地投射在每一个文明体的发展进程中的文明形式。因此,某个文明体的表现状态如何,会影响它在人类全体文明中的位置、作用与影响力。这便是人类文明史中总是呈现出主要文明与次要文明之分的缘故。如果说在古代文明发展阶段上,几种主要文明按照区域而各自发展的话,那么,现代文明则主要由西欧文明体现。^[5]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文明形式不具有主要文明的潜质,且在历史的演进中不再能够发挥主要文明的作用。在文明的发展中,一些文明流产了,另一些文明停滞了,而其中一些文明则崛起了。总之,一个具体的文明处在文明体系中的什么位置,关键看这个文明体是否保持了文明发展的旺盛活力。^[6]

二者,认识古代文明,需要对文明发展的古今之变保持清醒态度。文明不是一经产生便凝固不变的。相反,文明的演进过程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文明的演进,既有历史内容的丰富化面相,也有文明程度提升的实质性改善。就

前者言,是一个文明从区域化发展向全球性扩展的过程;就后者论,则是一个文明程度的显著提升现象。文明程度的提升或升华,既有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同时性存在所呈现的优劣即发展水平的高低,而催生的文明间良性竞争促成的文明发展动力所促使的文明发展;也有文明的历时性之间凸显的改善性效应,所促成的文明水平提高与文明向度多样化结果。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人类文明史上的古今之变,是最为值得重视的文明史大事件。在人类文明史上,古代文明创造了它的辉煌业绩:人类发现了自然运行的秩序秘密,也找到了供给心灵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方式,还对人自身的生物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方式进行了有效规划。但古代文明在为人类文明奠基且给予持续推进的同时,也内在地理定了文明发展的广度与高度:一者,在确立了高于人的神性权力以阻止人性的嚣张与妄为的同时,以神性权力的人的承载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失当行为,妨碍了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成长;二者,以对人文知识的系统建构,促进了人的觉醒与人对自身与社会的深刻认识的同时,没能大幅促进人对自然的精确认知和系统建构,且没能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积极互动结构确立起来;三者,在古代文明体之间,形成了消极与积极互动的两种机制,因此构成了文明进步的正负两种动力,前者以其警醒作用而让人类意识到维护文明拒斥野蛮的极端重要性,后者鼓励人类而让人们意识到促使文明进步的绝对必要性和无可逃避性。

古代文明因其内在的局限性,而必然在其优势保持下来、缺陷必予克服的总体走向之下,迈进更为健全的现代文明形态。现代文明既不是脱离古代或传统文明、横空出世的文明形式,而是将古代或传统文明纳入自身的文明形态;也不是一种彻底挣脱了人的局限性的文明形式,它仍然是需要在文明体之间的广泛竞争中发展的文明形态;因此,文明体之间的不当竞争,还会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出现令人心惊的悲剧事件。当然它也还不是完美的文明,它需要人们理性地认

识到,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是一个大趋势。这就意味着现代文明的自身发展,还需要人类对之报以高度的警惕性和自觉性。正是在这些规定性之间,现代文明呈现出它的独特之点:其一,现代文明是一种建立在神性和传统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基础上的理性文明形式,它的世俗性特点非常突出,但并不拒斥神性和传统文化发挥其现代功能。相反,神性、传统与世俗文化之间的互动,成为现代文明的精神特质。就此而言,那种一定要将世俗化特点比较突出的现代文明再安顿于神性文明或传统文明基础上,并寄望由此克服现代文明的基因缺陷的努力,实际上是对现代文明的复合结构缺乏醒觉的结果。其二,现代文明在知识形态上,不再是一种人文知识主导的知识体系,而是由科学知识全面主导的知识系统,但科学知识、人文知识与社会知识构成其知识体系的三个分支结构。故而,现代文明中的知识结构,相对于传统知识体系来讲,更为健全合理。在这个意义上,由“三种文化”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组成的知识体系,构成现代文明的、更为完整的知识系统。“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通过根除极端宗教狂热的原则,为他们的社会作出了贡献;自然科学为我们舒适的生活、健康的身体及澄清令人迷惑的自然现象作出了贡献;人文学科清楚地表达了由历史变化所产生的公众情绪的变化,并毫无保留地捍卫着某个历史时期似乎适合于他们社会的某种道德姿态;社会科学试图评估两个团体的种种主张。”^[7]这种复杂的知识系统,在古代文明中是不存在的。其三,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历程中,仍然存在令人怵目惊心的野蛮,而且是以理性形式呈现的惊人野蛮,纳粹德国的“最后解决方案”,便是这种野蛮性的最残酷的体现。但是,相对于古代文明而言,在现代文明体系中,人类对野蛮与文明边界的认识更为清楚明白,以文明抗拒野蛮,是现代人类文明的自觉取向。为此,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安排,成为引导国家前行,并保持社会政治文明的趋同选择;在国际社

会里,尽管总体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经常性引发暴力冲突,但国际社会一直在顽强努力经由理性谈判和条约订立来维护和平秩序。这是现代文明乃是以政治文明主导的文明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现代文明漫长的前史阶段,古代文明为之积累了深厚的文明成就。但相对于现代文明而言,古代文明之所以被取而代之,不是因为古代文明是与现代文明对立而在的文明形式,而是因为古代文明本身发展的演进性逻辑,它的不断刷新与进步,驱动它走向现代文明的一端;与此同时,现代文明自身的成长机制与驱动力量,也使它成为纳神性与传统文明于自身的文明体系。因此,以17世纪划界,人类文明的古今界限鲜明展现在人们面前。催生现代文明的17世纪欧洲,既是一个乱世,像英国的内战、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时也是一个群星灿烂、催生现代文明的世纪。“17世纪是革命的世纪”。^[8]在这个世纪中,昭告现代降临的文学天才如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哲学天才如笛卡尔、培根、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科学天才如伽利略、牛顿等,以及一大批艺术天才,共同催生了一个引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巨变的现代世界的降临,这是直到今天可以追溯的现代文明体系化的源头。^[9]在17世纪现代文明正式宣告降临之际,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蓬勃的现代化社会变迁运动与之的内在联系。因此完全有理由讲,试图真正理解现代化,必须确立起相应的文明视角,才有可能。

二、文明及其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世界浪潮的又一波。^[10]现代化的世界演进,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跃升。现代化的浪潮,依照17世纪成型,18世纪启蒙运动推向全球,19世纪确立其世界主导地位,20世纪构成全球社会变迁的主流,中经诸多变化,但现代化主流未曾被动摇过。中国是在19世纪的现代化世界浪潮中,开始融入现代化

所引领的现代文明洪流之中的。中国之所以会融入现代文明的浪潮之中,既是因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前路出现了极大的障碍,因此很难沿循古代文明的既定轨道再往前行。文明的转轨问题,已经在明清之际鲜明呈现出来;同时也是因为中西文化的接触,让中华文明的发展遭遇新一轮的、陌生文明的巨大挑战。这次挑战,不像古代阶段中遭遇过的佛教文明的挑战。作为一种宗教文明形态的佛教文明,不仅在中土传播过程中逐渐失去它的政治关怀,成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宗教化人生理念;而且也在与儒道两家的思想竞争中,逐渐被两家汲取思想精华,让其初入中土时所具有的神性价值挑战性基本受到瓦解;佛教更是在唐代实行的三教合一政策中,被国家权力所整合,成为古代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世俗性极强的儒家,由于在宋以后殊难坚持其高于政治的德性政治立场,放任“以天下私一人”的明朝政治衰败,着重将“灭山中贼”转向“灭心中贼”,因此无法阻止明朝的整体衰颓,终至断送权力,被清朝所取代。而早就转入民间的道家与道教,虽然保持了抗拒与批判的基调,但没能形成矫正国家方向的新思维。于是,在完全相异的文明体系,也就是将现代文明与西方文明高度同构的文明形态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转轨无方、应对失措、方寸大乱。在无以应对西方文明向中国传统文明发起的挑战中,既有自成体系的西方宗教文明即基督教文明所携带的、世俗化中国难以化解的精神文明形态,也有现代化特质极为鲜明的世俗化文明如人道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等等文明要素的强大冲击,还有显现现代文明强大力量感的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两种软硬兼施的文明体冲击力。可以说,自晚清时期,中国之所以融入现代化的滚滚浪潮之中,是由传统文明后继乏力与外来文明强大冲击的双重力量所致。

中华文明自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与非常辉煌的文明成就。这是中华文明能够不断秉承古代文明传统,踵事增华、光耀历史的重要理

由。在足以显现中华传统文明的元典文明时代,中华文明的草创者们,跟当时世界主要文明体的创制者一样,发现了大写的人,因此开创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华传统文明的演进,主要依赖的是内生动力,像佛教那样的外驱动力,不惟动源很少,而且动力不足。而人们常说的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的“秦制两千年”,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一种简单化概观,不足以呈现传统文明自身演进的历史面貌。因此在历史哲学上对之作出的首尾两变概述,即开创时期的“秦汉之变”与现代转轨时期的“清民之变”,并不能准确描述中华传统文明演进史的丰富性、多样性与自驱性。就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历史而言,起码在内驱动力的推进下,经历了国家结构重铸的周秦之变、国家治理模式优化的秦汉之变、国家体制改善的唐宋之变、国家重寻基本方向的明清之变,以及促成国家现代转向的清民之变。^[1]这是西方文明大规模进入中国以前,中华文明在历史变迁中逐渐生长、成熟、自我优化的一个长过程。文明的进步,在中华文明的古代阶段中是得到了充分呈现的。

正像中华文明演进的古代阶段那样,文明进步的古代逻辑,基本上是在相对固定的地域中呈现的。或者说,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像在现代条件下那么普遍和富有生机,未能构成各种古代文明体进步的主要动力。不同古代文明体的演进动力机制,似乎都有某种自足性。这也是前述八大文明体得以成型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进入现代文明阶段,由于市场经济的逻辑,也就是从地区市场、全国统一市场到全球市场的扩展逻辑,让古代文明发展的地域意义显著下降,让现代文明发展的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强。从此,文明的进步,不是某一个文明体可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与相应自足的条件下实现的目标。随着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确立,相应的现代政治运行逻辑也展现出来,既致力保护国内民众的国家权力机制,也必须保护国民在海外或国际市场的商贸利益。于是,以市场先导的国家利益,成为先

发现代国家在国际社会争夺市场的武力输出导因。这也许是现代文明建构过程中,人类必须偿付的极大代价?!但确实,至少在西学东渐同时出现的西力东渐,摧毁了东方社会固有的社会机制,让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不得不步入从传统到现代的不同文明轨道。

因此,中国开启其现代化进程的初期,关于现代化的记忆是相当矛盾对立的:一方面,中国接受现代化的“命运”安排,尤其是在物质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中国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欢迎态度的。循序渐进,中国现代化逐渐由物质器物的现代化逼进制度的现代化。这使晚清现代化阶段刻画出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的运行轨迹。但另一方面,由于是先行的西方现代化国家联手东来,逼迫中国打开国门,因此,中国是在西力东渐的处境中,在主权丧失的痛苦体验里,开启和推进其现代化进程的。前者是中华文明的提升状态,后者是中华文明的惨痛经历。因此,中华文明的现代升华,并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

这是一个文明演进与升华的普遍难题。从文明升华的一般理论论述上看,文明的升华问题包含复杂的理论内涵。一方面,人类一旦迈进文明的门槛,便永久划分开了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在文明与野蛮的比较框架中,只存在文明与野蛮的划界与维系问题,不存在更文明的问题。换言之,如何杜绝文明层次的下降、文明扩展的不畅、文明升华前路的堵塞,成为以杜绝野蛮为前提的一个促进文明改进的负面实践。之所以需要首先指出维系文明的负面努力一面,是因为人类始终是在人的动物性、人性与神性之间聚集文明演进的动力的。不兜住克制动物性的蛮性之底,就无法有效遏制人性的恶习、发扬人性的善良,就无法为文明的升华提供持久的动力。这当然不是说以善制恶的单纯选择,就足以构成文明升华的纯粹动力。善与恶的交织,以及善与恶的竞争,一直是存善去恶的人类文明,尤其是伦理道德文明努力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聚集人类文明发展的善性动力,同时就是一个与人性之恶进行

艰苦奋斗的过程。在人类迈过从传统到现代的门槛时,人类的伟大进步之一,就是对善恶的辨认能力大大提高,并达于一个高度自觉的状态。但这也并不等于就让人类完全脱离了人性之恶。在善与恶的相互写照中推进文明进步,是人类的一个基本处境。因此,文明的进步,不是一个在人的谈笑之间、轻松快意就可以取得的成就。

另一方面,从文明发展维度上看,即使暂时撇开文明与野蛮的交织与斗争不论,也还得看到,文明进步过程尚存在一个文明程度与高度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换算为文明的改进问题。文明发展的总体线索是进步的,这是人类认同文明、拒斥野蛮的信心之所在。相对而言,文明及其进步,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文明的领域一直在增加着。迈过初民社会的野蛮局限,进入文明社会阶段,人类首先在政治领域中取得了权力聚合的成就,同时在经济领域里取得了分工合作的巨大进步,在社会领域里成就了群聚性行动的习性。这似乎是说人类迈入文明门槛之际,就拓展了一切文明领域。诚然如此。但在文明领域的拓展上,从古至今都处在一个领域更多、范围更广的状态。这里的领域更多,不是指超出政治、经济与社会这些基本领域之外的领域,而是指这三大领域中不断有开拓性的领域向人们敞开,譬如在政治领域中从集权、专制到分权、民主领域的迈进,经济领域从权力垄断资源到市场分散资源的发展,社会领域从谨守自然秩序到区分领域和阶层的自治的发散。总之,随着现代化向纵深地带的推进,社会各个领域的现代化便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其二,文明的地域始终在拓展着。现代化起自英格兰,在17世纪成为第一个政治规范化、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多元化的现代化国家。这是英国1215年贵族与约翰王达成《大宪章》,付出450多年漫长时间代价,而取得的政治成就;也是在逐渐规范国家权力的基础上,以不断的社会政治改革举措,让国家权力的运行、民主的政治机制与经济的发展范式逐渐成熟起来,以至能够

成为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12]在英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欧陆多个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北欧诸国,都在发生相应的现代转变。但最终英国成为欧陆国家,尤其是法国的现代化典范。可以说英国范式成为欧陆国家现代化的灯塔。^[13]由此,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地区。从欧洲向外拓展,北美成为第二个现代化地区。跟着亚洲、南美与非洲的现代化进程被启动,现代化终成一个全世界范围的社会变迁过程。现代文明借助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已成为一个不可逆的社会演变趋势。

其三,文明的进步始终在进行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没有止步于它与野蛮划出历史性界限。随着文明与野蛮的划界,文明一直迈着自己的发展步伐:这不仅在于文明总是在与野蛮的写照中获得它的清晰边界与基本内涵,而且还在于文明的广度不断扩展,发展程度总在持续提高:从人类文明的认知向度上,科学在人类文明的认知进步上发挥了极大的解放作用,让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理解得到极大的深化,并且因其与技术进步的携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存状态;在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面上,人的觉醒与社会的理性化程度、自治的组织化程度,都非常令人瞩目;在人类文明的政治组织方式上讲,随着民主制度的多样化、有效化与规则化,让曾经充满血腥的政治世界显著走向理性与和平;在人类文明的经济活动领域,随着人类对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规范化与高效性的认同与取法,人类免于匮乏的生存文明得到根本保障。

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样的进步,如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并不是那么惊心动魄的,它是在日常生活中漫不经心地实现的。但从总体上讲,现代化的先行地区欧洲,“在同一生活范围内人的行为标准是如何逐渐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的;展现了人们如何就餐、如何就寝,又是如何与别人发生争斗的。在这样或那样一些日常事务中每个人的行为和感受逐渐地发生了变化,逐渐地走向了‘文明’。”^[14]当这种由

现代化所推动的文明进步过程,从欧洲向外扩展时,文明与不文明的边界意识与挤压作用,便将整个人类推向现代化发展的同一个方向。“人的行为和经历,由外部强制和自我强制来控制的个人情感以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所有行为的构成也会朝着某一个方向变化。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往往是:自己所处国家的人比以前‘文明’了,其他国家的人‘不文明’,甚至比自己国家的人‘野蛮’。”^[15]这是一种由人与人、国与国相互激荡的文明进步过程。正是在这种文明进步的潮流中,中西经由文明间的接触与交流,促成了中国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急遽转变。自然需要指出,与现代化相伴随的文明进步,肯定不是一个线性进步状态,而是充满了起伏跌宕的曲折历程。

三、现代化的文明

如前所述,理解现代文明的发展,可以沿循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线索,二是现代文明自身演进的线索。两条线索在之前的论述中都有所涉及。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将焦点落在现代化文明的兴起、兴盛及其全球化进程上,这样才有助于人们理解现代化的基本指向,以及由此给“中国式现代化”确立的、旨在升华人文明的根本目标发挥着怎样的引导作用。

现代化的文明是自成体系的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是横空出世的文明形态。在直接催生现代文明体系的西方,它的历史渊源如希腊的理性精神、罗马的法治实践,以及中世纪的宪政积累、科学萌动,现代早期的人文主义复兴与启蒙运动,都为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东西方社会的关系上看,现代文明的降临,与两个区域的文化—文明交流具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在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两大文明体系之间的碰撞,让中国的古典思想,直接影响了启蒙运动的方方面面。“在十八世纪时代,欧洲哲学思想的来源有二:一是希腊,一是中国。不过比

较起来,在这两个来源里,中国思想的影响比希腊的为大。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受希腊的文化影响较深,但到了启蒙时代,希腊的影响已为中国文化所代替。……中国哲学输入欧洲,从直接方面说,一方面反响为法国唯物论哲学,一方面为德国观念论的辩证法。”^[16]简而言之,中国传统哲学对现代欧洲两大重要的哲学思想建构,都发挥过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西传统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兴起发挥过让人重视的奠基作用,但两者间的关系,毕竟不是一种直接相等的关系。现代文明,自有其萌芽、生成与演进的过程。

在现代文明发展的早期,出现过一个西方式现代原创文明从欣赏相异文明到挣脱这些文明的影响,走向一个相对独立生长状态的演变过程。这从伏尔泰对中华帝国的钦羨到黑格尔对中华文明的轻视上,可以得到印证。伏尔泰指出,“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自从四十多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觉得最简单的宗教也就是最好的宗教。”^[17]这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最高礼赞了。不过,黑格尔却认定,中国“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把自己的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因为它始终是独立的帝国。这样,它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帝国,只是自身平静地发展着,从来没有从外部被摧毁。其古老的原则没有被任何外来的原则所取代,因此说它是没有历史的……这只是一个国家的自然概念,它自身虽有发展提高,但并没有改变这个最初的单纯原则”^[18]黑格尔是在绝对精神演变的意义上处理“历史”概念的,但仅仅将中国历史放置在自然史的角度来对待,至少看不出他有什么心仪中国文化之处。在两人之间,可以说出现了急遽转变。出现这一转变,除开思想家个人关注的焦点不同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欧洲的现代文明获得了长足发展,因此作别了取法其他文明的谦恭,建立了独立生长的自信心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变化:现代文明的创制者与阐释者们发现,即使在

现代文明的非西方源头那里,现代文明得到了滋养,但只有在西方现代先发国家那里,才将现代文明的非西方零星要素在西方范围内有机整合起来,从而催生了现代文明。这便是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现代文明的产生特点,它考察了科学、史学、艺术、建筑、教育、文官体制、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技术、法律、理性主义等关乎现代(西方)文明兴起的主要因素以后,毫不含糊地指出,“在西方,唯有在西方才存在某种特定的理性化类型”,^[19]从而将零散地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前述因素,加以整合和理性化,铸就了“现代”文明体系。这是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断言:现代文明发源于世界各地,但由西方国家创造性整合而成。

有两个相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一是现代文明与西方文明在长时期的高度重合,这在两者较为单纯重叠时期的现代文明发展状态下,不是一个文明演进的难题。但在现代文明降临过程中,以及在现代文明越出欧洲范围的时候,它的蛮性扩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文明与野蛮相伴而生的情形,如何能够让人类理性区隔现代文明的文明成分与蛮性做派,因此取法西方文明的成功理念与做法,杜绝西方现代文明创生与推进中的野蛮成分?这是一个在现代文明史上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现代文明的诞生过程,并不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温馨缱绻的过程。如果将现代文明的基本要素归纳为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的话,它在政治文明、经济文明与社会文明上取得的巨大进步与伟大成就,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夸奖不已。但是,政治文明所取得的民主成就,是伴随着铁和血而完成的。不仅在立宪民主政体所依赖的民族国家建构上,它直接与三十年战争相连。而且,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之间,在现代早期为争夺国家发展资源展开的连绵不绝的战争,就更是令人惊心动魄。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将战争之手作为推进现代文明的手段,让欧洲人对现代文明的演进感到心惊肉跳、心生恐惧。一部催生了现代文明的欧洲史,就是一部金戈铁马、残酷征战的历史。烽烟连天

的战争,不仅催生了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也促成了一个“欧洲‘战国’时代的到来”,^[20]这中间“军事革命”的出现,很明确提示人们注意,现代文明并不是在宁静有致的状态下降临的。这自然不是说现代文明只有在绝对和平的状态下萌生与降临,它才是“文明”的,否则就是野蛮的。因为战争常常是文明降临的催产婆。但在现代文明创生过程中,人类所经历的悲剧、惨痛与血腥,一点都不比古代文明演进时期少。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也是催促人类文明进行重大改进的动力。这让人们进一步知晓,市场经济支持的理性、共赢的交易机制的形成,也不是单纯经由市场空间和借助经济手段实现的目标,而是在政治、军事对峙与胜败的残酷基础上达成的。即便是伴随经济革命而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也与战争有着高度的关联。社会领域中的多元文化状态,只有在长期的惨无人道的种族、民族之间的对立、清洗与滥杀中,才逐渐确立起来。^[21]这是一个令人至今不敢正视的历史悲剧。

现代文明的欧洲创生过程,充满了不文明或野蛮的行径,这是由历史书写下来的事实。而在现代文明超出欧洲范围,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过程中,就更是以一部殖民扩张的历史,提醒人们,现代文明的地域拓展,也是一部充满征服、掠夺与侵害的历史。从15世纪开始,首先由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其世界范围内的攻城略地、侵夺财富的进程。葡萄牙人对印度洋的侵略、西班牙人在大西洋的征战,是人们所熟悉的早期殖民史。随之而来的西方国家如荷兰、法国、英国对美洲、非洲、亚洲的侵入,战争频仍,冷血掠夺,让人们透过亚、非、拉美如今还很强烈的殖民史记忆,不断被现代文明拓展阶段的西方国家野蛮行径所激怒。这些旨在掠夺后发国家的殖民帝国,主要是受传统国家的掠夺习性的支配,其现代国家的品质需要继续提高。但因为这些行径伴随着现代文明成长而出现,让人们对现代文明的记忆变得异常复杂。“欧洲扩张基本上集中表现为海外帝国主义和海外殖民主义,亦即怀着强烈的

欲望,成功地占领、统治和掠夺美洲、亚洲和非洲殖民地。”^[22]可见,推动现代文明成长的现代化过程,确实与相当不文明,甚至是极为野蛮的西方国家的行径联系在一起。

需要将西方国家在推动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文明与野蛮行为区分开来。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人类没有成长到完全受人性原则引导的情况下,那种纯粹基于人性、人道主义的文明原则在世界范围内行动的逻辑,根本不可能浮现出来。原因很简单,在动物性、人性与神性的人之三重本性结构中,约束动物性需要作出最艰难的努力,才能将人性发扬光大,并且逼近完全利他的神性。这正是人类文明成长的基本逻辑。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建构中,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成功限制国家权力,在经济上成功开拓高效率的市场经济,在社会领域中成功开辟理性多元论引导的宽容氛围,可以说为人类文明的显著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应当充分肯定西方国家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的理由。但同时,对西方国家在现代文明建构中的野蛮行为,也需要明确指出、加以批判、痛加反思、根本改进、全力禁制。这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中,明确强调“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的缘由,也是强调人们需要深刻铭记“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原因所在。^[23]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到给人类带来现代文明的同时,不能忘记它曾经带给人类的深重苦难,这是人类能够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维护文明、拒斥野蛮的保底需要。

二是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一个阶段的文明形态,它在什么意义上承继了文明的一般原则;又在什么意义上改进了人类文明的原则,并且表现出现代文明的独特之处?这是一个在人类文明的构成上需要甄别清楚的前提。现代文明,既不是人类文明的开创形态,因此它与传统文明的关联应当被重视;现代文明,也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结形态,因此它必须在人类文明的升

华中发展、改善自己。就前者言,需要看到,现代文明乃是从传统文明发展而来的文明形态,因此它继承了传统文明的优势,这是今天东西方社会的人们“言必称希腊”“言必道先秦”的重要理由。在重视人、人道精神的基本价值向度上,古今文明具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就后者论,现代文明之为现代文明,不仅在于它继承了自古代文明以来的人类文明光荣传统,而且也在于它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崭新价值与制度机制:这其中最伟大的地方,首先就在于它成功限制了嚣张的国家权力,将之驯服于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平台上;其次则在于它发现了物质器物高效生产的市场经济机制,不仅让人类摆脱了饥饿与匮乏的长期困扰,而且以富有创造性的、由科学技术引导的工业化机制,凸显出一套在农业文明时代完全不可想象的高效物质生产方式;再次,它超越了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生活中严重的不宽容状态,创制了一套不同宗教、民族、群体与个人理性相处的社会文化机制,从而在根本上克服了古代社会中层屡屡出现的、你死我活的观念对峙,让人类文明体现在日常生活世界之中。这是一个现代文明在文明与野蛮之间,逐渐克制野蛮,走向更为文明的状态的鲜明标志。如今,即使扩张还是一种文明的常态,但扩张本身逐渐为文明所驯服。这一点在世界中的欧洲行为模式上,可以得到证明。“尽管早已不再扮演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角色,欧洲还是呈现着扩张性。2013年欧盟拥有28个成员国,人们还看不出其扩张终止之日。2014年它毫不犹豫地容忍了俄罗斯的挑战。然而欧洲的发展壮大几乎不再像以往那样靠使用武力,而是凭借自己的经济魅力,即不是通过自己已逐渐弱化的硬实力(hard power),而是通过一种软实力(soft power)来实现,因为欧洲人的主导动机不再是以往的对真正信仰的传播或在争来斗去的多元世界中寻求民族的壮大,而是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这一观念直到20世纪才在欧洲经济思想的帮助下产生,欧洲得以及时地以这一极为有效的新理念取代了旧有的、在

持续的扩张行为中为自己正名的观念”。^[24] 现代文明,是在不断吸取野蛮行为所带来的沉痛教训,尤其是在吸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深重教训的基础上,明显取得进步与升华的文明形态。但其文明进步的业绩,超出历史上曾经创造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的古典文明时代。

国家是古往今来承载文明的主体单位。古代国家间寻求宗教、政治与经济理由,展开漫长和持续的征服战争。战争是一种与古代文明成长相伴随的经常性现象。这并不是说在现代文明条件下,战争就消失了,永久和平就达成了。而是说,由于现代战争的残酷性远超冷兵器时代的古代战争,因此它让人类清晰明白地看到文明相待、理智处理分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社会在总体上趋于文明化的状态,从根本上降解了蛮性行为的根源,促使文明的广度拓展与程度升华。这是一种似乎悖情而实际上相当合理的进步。“总而言之,工业—技术革命,特别是其中的自由主义发展路径,已从根本上降低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在满足人类欲望方面,暴力选项的吸引力已变得远远不如竞争与合作的和平选项。此外,社会越富裕,人们的迫切需求得到越充分的满足——‘需求金字塔’自下而上有无数欲望可供其沉溺——他们就越缺少动力去冒着伤残死亡的危险而行事。”^[25] 这可能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最野蛮的战争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一个大历史概观:人类总是要追求成为个体强者与实现国家强盛的,但从古至今,这样的追求,已经呈现出一条显著的大线索——非规则或暴力化追求强大,是古典文明时代国家的基本指向;以规则或文明手段寻求强大,是现代文明时期国家的精神宗旨。从单纯的强大认知到复杂的规则信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大跃升。这也是现代文明纳传统于自身、总结归纳现实经验与教训、并理性展望未来而走出暴力对峙与寻求和平的竞争与合作的积极成果。这也是促使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拒斥蛮性理念与行为,选择坚决站在文明一边的重要动力。

“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26] 这无疑是期待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理性区分了现代文明的正剧与悲剧,从而择定了捍卫现代文明立场的表现。这无可怀疑地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文明的价值向度。

四、“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明升华

如前所述,现代文明长期与西方文明高度重叠。因此,在现代化思想史上,几乎一直存在着现代化就是西化的观念。这不是一种人们通常认为的简单、幼稚的观念,而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依据与现实判断的说法。在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的理解上,人们常常以人种、肤色、头发、生活习惯来定位,这其实是一种背离了现代化就是西化的原意的肤浅与随意的理解。“全盘西化的必要,至少还有下面二个理由:(1) 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2) 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27] 理解全盘西化的主张,不能离开这两个理由来随意发挥、痛加指责、严加批判。在这种限定性意义上,全盘西化有其道理。否则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像陈序经那样的、对中外历史有着精深理解的历史学家,何以会说出常人都觉得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就是一切的一切都要西化这么荒唐的话来。当然,肯定现代化就是西化说法的某种合理性,并不等于肯定这一说法的全盘正确性。原因很简单,在文化的先进性或现代文明的前导性上讲,西方现代文明确实领先全球,非西方国家确实需要谦逊地承认这一点;同时,作为现代文明发展趋势的一个承载者的西方,确实也是后发现代文明国家需要潜心学习的对象。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将很难确立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择定发展典范、寻求发展的结果。不过,即便是西方现代化具有全球示范性,后发国家对之的学习,也一定是具有接受、转换、再创造特点的现代化过程。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现代化与不同地区的既定文明与不同国度的实际情况的结合,会催生新的现代化模式,也会促成不同文明体系与现代化整合的进路,这样也就势必会让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其他文明因素进入现代化进程,让现代文明显得更加丰富多样。这样的现代化进程,自然就不是从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向西方发起的现代化一端的倾向性运动上,可以得到完整理解的社会变迁过程。它需要在两个方向上,也就是现代化诱导非西方国家发展方向,同时在西方因素与非西方现代因素的聚合性发展中,产生现代文明的不同文明间混合结果上,得到完整呈现和准确理解。

对此,可以在东亚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印证。东亚的现代化,在模式上曾经被称为是儒家文化圈的现代化。这是因为,东亚三国即日本、韩国、中国,被认为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具有深厚的古代文明积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儒家传统文明,塑造了不同于西方文明圈的文明形态。如前所述,这一文明曾经在现代西方国家的著名学者那里,得到过赞许与拒斥的不同评价。透过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可以看出,在西方学者眼里,东西文明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因素与现代化变迁互动,确实让三个国家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文明的特点。加上台湾地区、新加坡这两个儒家文化圈的地区与国家,一同呈现出的某些现代化特征,人们将之命名为“东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独特性,正好反映在文明的基本预设上面。“在东亚,即使是在最现代化的部门里,仍然可以目睹一种集体团结和纪律的价值,最近有关日本企业和工业管理的讨论已使这个特性显得尤其突出。东亚是否已经创造出一种非个人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呢?如果是,那么现代性、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就不是那么不可避免和内生的,而必须要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再做诠释。”^[28]直到今天,是否存在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还是一个存在广泛分歧与争执的论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东亚现代化已经为现代化

融入了不同的文明因素。这直接挑战了前述马克思·韦伯的现代化解释模式,即现代化主要是西方文明内生的结果。人们会认为他对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解释是错误的,至少是具有缺陷的,因为亚洲的文化与宗教传统或亚洲文明并非不适应现代化,实际上不仅可以适应,甚至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文明动力。^[29]

如果说之前东亚的现代化进程表明,儒家文明或中华传统文明可以适应并促进东亚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也只能说是儒家文明或中华传统文明在非中心地带提供了相关论证的证据。在儒家文明或中华传统文明的中心地带,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如果其现代化进程不出现相关现象,就很难证明儒家文明或中华传统文明能够成功促成一种“东亚现代化模式”。在中国大陆依靠改革、开放相互促进这一区域的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人们也曾努力寻找它与儒家文明的关联性。但不得不说,在中国大陆最近一轮有力促进现代化进程的初期,它与儒家文明或中华传统文明的正相关关系并未鲜明呈现出来。原因很简单,从历史上来看,国家的领导者们与儒家文明之间一直处在一个明显的紧张状态。至少“评法批儒”的记忆会提醒人们留意这一点。而上溯到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潮,中华传统文明与中国的现代化所呈现的巨大张力,乃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直到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朝纵深处推进之际,关于传统文明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才以一种消解紧张、促进互动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此前,传统文明对中国大陆现代化的推进,可以说是在文明预设的意义上呈现的,也就是在前述“集体团结和纪律”的意义上呈现给世人的。但在近期,决策层已经意识到国家现代化的纵深发展,也就是处在“改革深水区”的中国,需要复兴传统文化—文明了。这是一种以传统文明促成现代文明的决断的表现。为此,国家领导机构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期为中国现代化聚集雄厚的文化—文明资源。

为中国进一步的现代化聚集传统文化—文明资源,在总体目标上,旨在推动实现传统文化—文明的复兴,促使中国传统文化—文明与中国现代文化—文明的吻合性发展。“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30]基于这样的目的,国家自觉而全力推动传统文化—文明的复兴,在文化—文明的“核心理念”上,致力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进行精神连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理念。”^[31]而在中华传统德性文明的现代发扬上面,着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32]进一步,需要着力发扬中华传统文明的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

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33]很显然,从这三个方面可知,在中国现代化向纵深地带推进之际,复兴传统文化—文明,不是仅仅在一些具体做法上的提倡,而是在传统文化—文明基本价值、精神结构、制度理念、文化氛围上的全面继承与发扬。这些内容,一些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基本构成部分,一些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的独特构成部分。从总体上讲,这样的官方倡导,是在为中国的现代化聚集文化—文明资源,完全可以将之视为中国不再将现代化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而同时将之看作是文化—文明发展的过程的标志。因为它不仅将中华传统文化—文明的核心理念、美好德性、人文精神罗列了出来,而且还以政策举措保障其落实,不仅因之要求加强中华文化的研究阐释工作,而且要求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不仅要求致力保护文化遗产,而且要求以之滋养文艺创作、融入生产生活、加大宣传力度、推动中外文化交流。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为现代化提供文化装点的举措了,而是为中国现代化注入文化—文明强劲动力,并以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提供文明驱动力量的进路了。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谋划中,中国之努力实现现代化,追求的不只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更是中华“文明”的复兴。所谓追求民族复兴,是在中华民族近代命运转折,“落后就要挨打”的不利处境中,寻求扭转民族命运,奋力追赶现代化的世界步伐,跻身现代化强国的行列。所谓文明复兴,是要在中华文明自近代处在一个疏离世界中心,未能提供人类文明新动力的情况下,全力扭转文化—文明“入超”的被动局面,争取实现中华文化—文明的“出超”目标。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范围的现代化总体上迄今仍然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上的情况下,如何真正为现代化注入中华传统文化—文明因素,从而极大丰富现代化的文明构成成分,使之成为现代化

促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有力机制,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展示现代化与现代文明新景象的一个象征性问题。这可以说文明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之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新标志。

这正是中国选择一直站在文明进步的一边,拒斥“西方式现代化”曾经显现的野蛮一面,同时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刷新人类文明面貌的另一面的缘由。从人类文明的演进史来看,在文明与野蛮的关系框架中,必须以文明为坐标,全面禁制野蛮的举措。在观念上,需要严格克制蛮性理念,以文明为思维和行动导向;在实践上,需要有效约束一味逞强的蛮干,而以理性、和平、合作、共赢为取向。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所有现代化国家都体现出来的共同特点。与此同时,在中西现代化模式上讲,避免“西方式现代化”曾经出现且可能继续浮现的“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深重苦难”,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际社会携手同进、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代化新路,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目标。其前路不会平坦,势必会有起伏波折,但以现代化新文明超越现代化老机制的念想,总是值得赞许的:人类总还得在深怀升华文明的强烈期待中前行。

注释:

[1][2][23][2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3]法国《世界百科全书》“文明”词条,引自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译:《文明和文化:国外百科辞书条目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页。

[4][5][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夏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5、197-199页。

[6]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53页。

[7][美]杰罗姆·凯根:《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王加丰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第256页。

[8][9][英]A.C.格雷林:《天才时代:17世纪的乱世与现代世界观的创立》,吴万伟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12、22-23页。

[10]参见任剑涛:《在现代化史脉络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11]参见任剑涛:《常与变:以五大变局重建中国历史宏大叙事》,《中国文化》2021年第2期。

[12]钱乘旦等指出,“英国通过三百年演变,和平长入现代社会,走了一条渐进改革的路。”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四章第二节“英国史道路:渐进改革之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1页。

[13]参见任剑涛:《我们全都降生在一个英格兰制造的世界》,《东方早报》2014年3月2日。

[14][15][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1、1页。

[16]朱谦之:《十八世纪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的影响》,《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

[17][法]伏尔泰:《哲学辞典》,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31页。

[18][德]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4-115页。

[1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三版)》,苏国勋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20][25]参见[以]阿扎·加特:《文明世界的战争》,钱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56、833-834页。

[21]参见[英]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严春松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页。

[22][24][德]沃尔夫冈·赖因哈德:《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周新建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1、1页。

[27]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由》,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403页。

[28][29][美]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罗荣渠主编、[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24、423-424页。

[30][31][32][3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责任编辑:马立钊]